

广东客家农民的高生育观念

李涌平

【提要】 客家人在千百年的繁衍生息过程中,不仅形成了特有的客家方言,还形成了特有的客家生育观。本文试图从迁移——高生育的历史继承性、语言——生育扩散性及生育的生殖崇拜这三个方面解释客家人的高生育水平,并简单地论述了传统生育文化和现今社会适应的问题。

【作者】 李涌平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教授。

一 引言

1993年的寒假,北京大学赴客家考察团对粤东客家地区进行了多方位考察。在生育方面,我们用问卷和入户访谈的形式对客家农户进行了实地考察。我们考察的地点是广东梅州市近郊、大埔县、丰顺县和饶平县所属18个村庄,考察的对象是已婚育龄妇女(15~45岁)。为了详细了解客家人的生育行为和生育观念,在考察中我们运用了统计学定量方法和人类学定性方法。从定量上,我们收集到了632份问卷,总计调查到1980~1993年出生的婴儿1427人。从定性角度,通过和客家人交谈,我们对客家农户的生育观形成了一些宏观上的看法。本文就这些看法做些分析和阐述。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有翻译和我们一起走访入户,很多被访者也能听懂我们的普通话,但大多数客家人只会讲客家话,这种语言障碍显然加大了分析的难度。不过我始终相信,客家农民的友好和诚实是提供准确信息的重要条件。

关于客家民族的归属和识别,学者们做了很多研究和源流考释,人们一致认为,客家人是汉族的一个分支。客家先民根自中原,历史上由于战乱灾荒及官职迁调等原因,自黄河流域辗转南迁。由于客家人入广东、福建、江西等地区较迟,平原沃土的地区已难于立足,大多向山区聚集群居,因而有“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的说法。过去由于人口众多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较为艰难,故男子多外出谋生,女人居守持家。现在广东的贫困县就集中在客家地区。在千百年的繁衍生息过程中,勤劳聪明的客家人不但形成了特有的客家方言和客家建筑(如围龙屋),而且还形成了特有的客家生育观。我们对客家人的生育观的分析,对其它山区农民,也许会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客家人在全国范围内,主要居住在南方。用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分县按比例进行大概估计,客家人口在1990年约为5300万。该估计与张卫东和刘丽川估计的1982年客家人口总数4056万人相比,在人口增长意义上是比较吻合的。1990年客家人口约等于1982年波兰和保加利亚两国人口之和。另外,据资料记载,海外各地客家人在1986年约有500万,主要分布在日本、印尼、泰国、越南、加拿大、美国等地。

* 本研究是在客家人刘锦庆和姚美良两位华侨先生资助的客家人综合研究项目下完成的,北京大学客家人刘锦云和黄书雄老师对文章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笔者在此致谢。

二 传统的生育观和可能的解释

为了描述客家农民的近期生育行为,表1给出了已婚妇女按年龄划分的生育率和总和生育率。该表结果说明,如果每个客家已婚妇女按1980~1993年的生育水平生育的话,一生约生育4个孩子。剔除已婚妇女比例的影响,这个生育水平和1990年人口普查时广东农村的总和生育水平2.9个孩子相比,高出近1个孩子。虽然有些富裕地区客家农户生育水平较低,但在一些边远山区、贫困村庄,生育6个孩子的妇女大有人在。通过访谈我们得知,当地严格执行两个孩子加4年间隔的生育政策,基层计生干部也非常有责任心。不过从调查结果看,严格的管理体制对客家农户生育行为只起了一定的约束作用,教育、引导、服务等综合措施还没跟上。严峻的现实告诉我们,提高干部的素质和业务水平,是今后要解决的急迫问题。其它诸如对客家人“超生游击队”的控制办法的制定,也是今后要深入探讨的社会问题。

表1 1980~1993年客家农民已婚妇女生育水平

年龄	15~19	20~24	25~29	30~34	35~39	40+	总计
生育率	0.201	0.285	0.265	0.034	0.006	0.003	3.97

我们的考察说明,广东客家人是一个高生育群体。除了客家农民本身生育率高外,婚龄较早也是重要的原因。我们把大埔百侯镇初婚年龄统计报表和我们自己调查的数据进行对比,发现报表平均21岁要比调查结果晚一年多。这说明有些客家农民虚报婚龄,可能把实岁报成虚岁,但也极有可能是瞒报。如确实瞒报的话,我们不得不怀疑客家生育水平在县级计划生育委员会统计中是错误的,它会给社会带来一些副作用。

客家农民在近期会有相对较高的生育率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首先是强烈的高生育愿望。客家人对妇女是很尊敬的,我们去的村中就有母亲堂。虽然这种尊敬是对客家妇女勤奋劳动发家致富的美德的一种颂扬,但实际上也许反映的却是对妇女多生孩子的鼓励和肯定。

我们在旧寨村入户访问时,一位生了5个孩子的妇女这样说:“我并不想生很多孩子,可多生孩子对我是有好处的。我现在在婆婆面前和众人是不错的,丈夫也对我好”。我们在走访中遇到了很多有这种观念的妇女。对这些客家妇女来说,她们的高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是通过高生育获得的,这种高生育还会促进夫妻关系的和谐。

奇怪的是,在高生育的现实下客家人非常重视教育。在被调查者中,有48%的人希望自己的孩子上大学,35%的人希望孩子上高中、初中,只有17%的人认为孩子上到小学或不上学都行。妇女的平均教育水平为高小。客家农户不仅愿意供养男孩上学,而且对女孩子也认为只要家里有能力就应该供她上学。这和正统的中原汉文化相差很大,因为很多中原地区普遍认为女孩子上到初中就是最高的教育了,并不赞同女孩子继续读高中和大学。理论上,人们通常都认为知识的高低和生育水平高低成反比。很多人认为追求高知识的父母生育率就会低。奇怪的是追求高知识、高技能的客家人却伴随着较高的生育水平。

在我们走访的许多村中,看到不少去沿海打工回村过年的打工妹和打工仔。作为一个学者我甚为吃惊的是,几个去沿海打工多年的客家妹都异口同声地说:“多子就是多福”,而没有人拥护“少生优育”的观点。这就不得不使我们在经济社会发展教育之外去思考,为什么广东客家人很难改变高生育的传统观念。

我们第一个假设是迁移-高生育的历史继承性。也就是说客家人作为从中原流迁到广东、江西、福建和浙江等地的汉文化汉民族的一支，为了保持和当地对外来势力入侵怨恨的反击与抗衡能力，除了勤奋劳动外生育是又一有效的办法。“人多力量大”是客家人在长期迁移生活中体会最深的东西。这种传统的高生育观念是求生存的社会表现。客家人为了生存，会以社会教育、社会结构的调整来达到这种生存的主导潜意识。可以想象，这样的社会体制在短时间内是不会消失的。因为客家人也许内心还在想明天也可能还会迁移，今天我们必须要多生孩子。按客家人的习惯说法，这叫做“骑马扶杖搭抓棕”，是一种加大了倍数的“保险心理”。这种“保险心理”曾经使客家人在任何复杂的社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但是这种较为狭隘的亲缘观念，在快节奏的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反映出了一些问题。如对区域资源的过量开采，对环境的破坏，以及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定程度的阻碍。

我们的第二个假设是语言-生育的扩散性。许多发达国家的生育率从高到低的转变已证实，有相同语言的人群会有相对的生育独立性。而这种生育独立性很难在短时间内因经济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改变而改变。客家人有自己独立的语言表达方式——客家话（客家话是中国七大现代汉语之一）。不少客家地区均有“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祖训。在一些客家地区，新媳妇进门不会说客家话的要先学会客家话；客家人的女儿远嫁后，回娘家时必须说客家话。据客家人说，所有离乡外出的客家人，不论在什么地方相遇，不管在什么场合，都用客家话交谈。而且旅居在海外的客家人，经历几代乡音不变。这说明客家人一方面在自己的方言上寄托了自己的情感，已远远超出语言本身的意义，另一方面，客家话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客家人内部的凝聚力。虽然我们不会讲客家话，但我们可以相信，做为一种口头表述语言，有关高生育率的赞许也许是多于批评的。口头语言也是有历史社会传承性的，这可能表现为生育观念上的反扩散性。语言的生存表明了使用语言人群观念的相对稳定性。这种稳定性又体现了在生育观念上的相对稳定性。

我们的第三个假设是生殖崇拜。由于客家人是中原汉民族的后代，他们具有民族自觉意识和自豪感，也具有以血缘观念为本源的“祖宗崇拜”。加之多次迁移后的生存竞争，客家人逐渐形成了强烈的族源观念。而这种族源观念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反映在生育崇拜的风土民情上。其结果就是强烈的高生育观。在考察中我们确实发现，客家人对生育有其原始的崇拜，而且这种生育崇拜在某些形式上还有其生命力。比如在山上有许多有如男性生殖器形状和同房静态描述的墓地。每逢过年过节客家子孙们必对其恭恭敬敬地供奉和朝拜。按学者的观点，生殖崇拜不是性崇拜、爱情至上。恰恰相反，生殖崇拜不仅强化了甚至部分地直接导致了女性的性压抑，而将生殖能力作为衡量女性价值的重要尺度，使女性感受到巨大的压迫。生殖崇拜无疑是压在客家妇女头上的重石。

以上三个假设是互相关联的。它们是客家人社会和历史背景的反应，可能都是与客家流迁传统紧紧相联的一种渊源深厚的文化行为，这包括几层意思：（1）习俗；（2）家族凝聚力；（3）与外来文化的交往。客家人由此证实了并且强化了人生在彼岸世界的继续存在，这几个方面结合起来，对客家农民的生育观产生了影响。在这种现实背景下，转变人们的生育观念是很难的，但也有成功的例子。

实行计划生育，有策略地有组织地进行少生优生的宣传，是转变客家农民旧生育观念的重要一环。梅州城郊三角镇在这方面有较为成功的经验。三角镇为了加强对群众进行人口意识的教育，积极宣传正面典型。上坪约亭村村民邱仙庆、陈利玉夫妇生了两个女孩后主动结

扎。陈利玉说：“生男生女不是关键，关键是怎样把孩子教育成有用之才。她们对孩子悉心管通，两个女儿在学校连年被评为三好学生。夫妇俩还用勤劳的双手建起了一幢占地300多平方米的住房。

镇领导抓住这个典型广泛宣传，使群众认识到计划生育不仅有利于国家的富强，还有利于自己早日摆脱贫困。与此同时，大多数富裕起来的村还组织55岁以上的老人参加福利会。老人们每月交纳5元的会费，便可参加福利会举办的各种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活动。另外，三角镇还想方设法解决老人的实际问题，切实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人们的生育观改变了，计划生育工作得以顺利开展。我为此走访了约亭村。在约亭村的调查表明，那里的生育水平不但很低，而且生育观念也符合国家的生育政策。一个客家妇女对我们这样讲：“要想富的快，就必须生的晚、养的少。”看起来，客家农民强烈的高生育愿望不是不能改变的。三角镇生育观念的转变成功了。该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大力发展经济和加速城镇化建设是不可否认的改变客家人生育观的重要因素，但有策略的教育和宣传也许是最能调动人们主观能动性的较为有力的措施。另外，我们还感觉到，三角镇的乡计生委领导非常有组织能力。这种有管理才能的领导班子看来也是不可缺少的。

三 由祭祖寻根引起的对中国文化的思考

由于考察时正值春节，我们赶上了祭祖坟仪式。成群的客家男女走上山坡，山坡上有他们的祖先的坟墓。只有客家男人和男孩子才允许在坟前上灯摆酒。我们发现在有的坟前人数少得可怜，而有的坟前，人丁兴旺。做为非客家人，我们为这种古老、庄严而烦琐的仪式所折服。一个考查成员这样写到：“客家人的上坟、点灯、祭祖、祭墓无一不在检验着一个家庭的生命是旺盛还是衰微，提醒着人们的责任和义务。在一次又一次活生生的祭祖演示面前，在一次次规律性的仪式活动中，每当人们看到那一座座杂草丛生、残破不堪的坟墓，听到别人祖祠里绵绵不断的人流和鞭炮之声，便会深深地体会到：每个人的生命似乎都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整个家族”。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事实，那就是祭祖寻根是客家人社会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客家人在这种环境中会产生出一种强烈的生育愿望，即必须多生孩子，多生男孩子，这样才能光宗耀祖。

祭祖寻根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所形成的社会文化基本内容。从一个角度讲，大多数人参加祭祖寻根的动机不是出自对于宗教的真挚信奉，而是希望通过宗教仪式来获得个人幸福和某些社会效益。从另一个角度讲，祭祖寻根活动也许很大程度上成了中国乃至在亚州文化圈中生活的民众高生育意识的生成环境及孕育场所。祭祖寻根这一文化在中国人头脑中根深蒂固，但中国人的缺乏怀疑精神的现实执着和圣境而非神性的追求，决定了祭祖寻根在生育内涵和外延上变更其导向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在中国文化圈，人们不但要“上事天，下事地”，尤其要“尊先祖”。这一方面体现了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另一方面在高生育观方面也反映了传统文化对未来高人口压力的忽视。但这不能怨我们的先祖们。他们生活在死亡率高、自然竞争能力低、自然资源相对富有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中，他们不会知晓社会的突变，那就是本世纪以来在医疗卫生和福利事业创世性的突破和工业革命对人文社会的巨大影响。这种创世纪的突破和影响在历史上是短暂的，是具有飞跃性质的，它已使人类的预期寿命从上一世纪的30多岁提高到今天的近70岁。这种突破和影响不仅迅速地使人类享受了盘尼西林等抗生素、B—超机和电子手术刀等，

而且也给人类带来了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和对过去认识的纠正,使其适应新的环境。这反映在中国生育文化上,就是传统的高生育观是几千年对高死亡率的社会反映。那么在低死亡率的现实下,这种传统的高生育观已不再适应低死亡率的社会环境。为了加速该过程以减缓高生育观不适应的副作用,人为地进行干涉和诱导,不但有其社会效益和社会意义,而且还是符合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潮流的。

祭祖寻根,本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但这种传统在现阶段也有其负作用。那就是祭祖寻根在很大程度上渲染了“多子多福”的传统生育观念。如果我们把计划生育工作比作调节生育观这个杠杆的一端的话,那么祭祖寻根就是这个杠杆的另一端。无节制地认同祭祖寻根热潮的蔓延,其结果是加重计划生育工作的负担。我们考察发现,祭祖寻根在客家地区已为计划生育工作带来了人为的思想障碍。笔者认为,有组织地诱导、控制和管理祭祖寻根活动,是有利于中国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的。

遗憾的是,某些地区的部分领导同志特别是基层领导干部已把祭祖寻根、重建祠堂、整理家谱等和引进海外投资挂钩。这些人认为海外华人有了认祖的地方就会在认祖的地方投资。这种观念是不成立的。可以肯定地说,海外华人投资的考虑因素与人文环境、经济条件、区域技术力量、自然资源以及交通运输密切相关,而与祭祖寻根这一感情纽带没有多大的必然联系。退一步说,即使有微小联系的话,以小利而失大义,也是不足取的。我们应该在人们拥护的基础上管理祭祖寻根活动,进行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的疏导,从而控制人口的增长。

四 总 结

本文在理论上,一方面提出了生育观的三个区域理论。它们是迁移—高生育的历史继承性、语言—生育的扩散性、以及生育的生殖崇拜。这三个理论的结合解释了客家人的高生育水平。另一方面简单地论述了传统生育文化和现今社会适应的理论问题。对生育文化的整体理解从宏观上解释了高生育的文化理论成因。虽然我们是考察客家地区而得出一些结论和看法,但这是有一般意义的。本研究希望有助于人们理解高生育和所造成问题的区域性差异和整体的雷同性。文章还提出了传统文化和高生育在现今是不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应该进行社会治理和诱导。

在未来,中国人的祖先崇拜是否可能而且如何减弱或转变其形式是今后要研究的。未来形式或许可能是国旗崇拜、自然崇拜、天体崇拜、土地山川崇拜或动物崇拜等,也可能为多形式共存的一种多崇拜。总之,可能的崇拜形式不但应具有民族上进意识和社会整体积极进取精神,而且更应适应社会的可持续发展^①。可持续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生育文化传统的转变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反映。对高生育挑战的未来社会治理理论和具体措施应该符合社会可持续发展这一基本指导思想。

回顾我们对客家地区的社会考察,在生育观方面我们发现了一个值得人们注意的问题。那就是如何解决现今强烈的传统生育意识和生育观念。只有解决好这一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客家农民高生育的问题。一些客家地区成功的经验告诉我们,有策略、有组织地进行宣

^① 中国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叶文虎先生对可持续发展作了如下定义:为了人类社会的持久生存和发展,人们必须建立新的资源观、价值观和道德观,以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和谐为发展目标,以经济与社会、环境之间协调为发展途径。这些新观念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是现代文明的核心内容。

传,而不是泛泛地讲大道理,加之解决农民的实际困难是高生育地区较为可行的措施。另外,控制管理祭祖寻根活动也是非常必要的。本文对造成客家地区的这个生育问题的社会学和人口学成因进行了初步分析和探讨,希望有助于未来找到更好的解决这个社会问题的办法。

参 考 文 献

1. 刘南彪:《客家及客家源流考释》,《客家研究》第1期,1989,同济大学出版社。
2. 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0。
3. 房学嘉:《客家源流探奥》,1994年,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4. 张卫东、刘丽山:《论客家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深圳大学学报》,1988年。
5. United Nations, 1983, "Demographic Yearbook."
6. 《海外各地客家人数资料》,新加坡《客总会讯》,1986年第11期。
7. 《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10%抽样》,1991,国家统计局。
8. 杨宏海:《粤东客家妇女的民俗特色》,《客家民俗》,1987年第2期。
9. 南山:《论客家文化意识》,《客家民俗》,1986年第4期。
10. A. Coale & Watkins, 1986, 《Europe Fertility Decline》。
11. 《大埔县志》,1991年,大埔县志编纂委员会。
12. 周达生:《客家文化背景考》,《客家研究》第一集;刘丽川、张卫东译。
13. Sigmund Freud,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 in The Basic Writings of Sigmund Freud,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Dr. A. A. Brill, 1966, Random House.
14. 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199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5. 吴南生:《南粤百镇丛书——三角镇》,1993,暨南大学出版社。
17. 侯杰、范丽株:《中国民众宗教意识》,《社会史丛书》,1994年。
18. 李向平:《祖宗的神灵》,第四和第六章,《文化探源丛书》,1989年。
19. 叶文虎:《创建可持续发展的新文明——理论思考》,《可持续发展之路》,1994,北京大学出版社。

(本期责任编辑:朱 犁)

